

大师经典

经典通读
第二辑

通俗阅读

TO READ MASTERS' WORKS IN AN EASY WAY

西方的没落

让西方社会倍感失落的巨作



(德) 斯宾格勒 著

韩 炯 编译

北京出版社

西方的没落

Spengler

(德) 斯宾格勒 著

韩 炯 编译

北京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西方的没落 / (德) 斯宾格勒著; 韩炯编译. —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8. 9

(经典通读)

ISBN 978 - 7 - 200 - 07317 - 1

I. 西… II. ①斯…②韩… III. 历史哲学 IV. K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26922 号

经典通读 第二辑

西方的没落

XIFANG DE MOLUO

(德) 斯宾格勒 著

韩炯 编译

*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网 址 : [www . bph . com . cn](http://www.bph.com.cn)

北 京 出 版 社 出 版 集 团 总 发 行

广东新华发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华新科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787 × 1092 16 开本 12 印张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 000

ISBN 978 - 7 - 200 - 07317 - 1/G · 3724

定价: 23.80 元

质量监督电话: 010 - 63973790 010 - 58572393

写在《经典通读》第二辑前面

《经典通读》丛书第一辑出版了一年了，20册经过全新编译的西方人文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的经典学术著作一经面世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赞美者有之——对西方经典学术著作进行通俗化的解读，让普通读者也能了解西方的文化思想是十分必要的；批判者亦有之——不是大师原著，读来何用？警惕快餐文化向学术圈进逼！

回忆丛书策划时人们对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卢梭、休谟、康德、马克思、牛顿、达尔文等一批对人类影响深远的大师的无限敬畏，以及对其伟大著作的只闻其名未见其详的无比难堪，可以说《经典通读》丛书实现了“大师经典，通俗阅读”的出版目的，完成了把艰涩难懂、鸿篇巨制的学术著作，转化为普惠大众的精神食粮的任务。试想一下，如果没有这个10万字左右的通俗读本，有多少人会真的捧起《政治学》、《政府论》、《资本论》、《人性论》、《战争论》、《社会契约论》、《国富论》、《相对论》……并能坚持读完？这就是《经典通读》的功绩，这就是为什么一套20册的学术书能在半年多的时间里累计销售30多万册的原因。

可以说学界对《经典通读》的出版是宽容和肯定的，大多



数专家学者开始明白，学术经典不该只是象牙塔中供少数知识精英把玩的古董，它们代表了人类文化思想的精髓，应该发挥其“以文化人”的作用，让尽可能多的人知道这些经典，了解这些经典，汲取人类先贤们的文化营养，分享人类思想的丰硕成果。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副院长、博士生导师袁济喜认为，研读西方经典，对于提高国人素质是必要的。中国自古以来便重视知识的通俗化，《三字经》、《千字文》就是经典通俗化的代表。从文化的长远发展来看，通俗的编译本是必然的，也是可取的。就坚持阅读品位、坚持图书导向来说，这套《经典通读》丛书也是很有意义的。

著名经济学家邢国均研究员说：当今多元化的知识结构使得跨学科的研究很普遍。比如经济学研究者可能希望了解一些哲学理论。而有些著作往往篇幅过长，且理论艰深、晦涩难读。如果有可靠的普及本，读者就可以对原著有一个概要性的把握和初步的了解。另外，对于初次接触某一新的知识领域的读者来说，对某些理论的理解可能不是很有把握，通读本就能起到引导的作用，读者可以参照编译者对原著的理解把握这些理论。如今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正的加速，需要大量国际化人才，而对西方思想文化的了解是国际化高端人才必备的素质。《经典通读》这样的丛书，有利于人才的培养与成长。

中国艺术研究院刘祯教授还就国学热背景下的西方经典阅读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就一定意义而言，整个20世纪的中国历史，就是国学与西学相互碰撞的历史。社会思想潮流的变化也是一种螺旋式上升的过程。目前社会上的国学热，其实是我国经济、科学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国人自信心增强的表现。以前我们看西学可能是仰视，现在可能就是平视了。也正因如此，才更应该将西学名著通俗化、普及化。另一方面，许多著名的国学家都是中西贯通的大家。如著名的清华大学“国学四导师”，他们除了具有深厚的国学功底之外，都对西方的思想文化有深入的了解。今天研究国学，也要懂得西学。

正如在《经典通读》第一辑的《编者的话》里写到的，“与世界接轨”，首先就该“让思想先行”。除了我们中国传统文化的普及，对西方经典文化也应积极推广。我们就是要打破这种传



播中的壁垒——几十万上百万字的沉重篇幅，几百年几千年的历史跨度，不同时期的艰深译文。要做到这点，通俗易懂、变繁为简最关键。换言之，再好的著作，读的人少，其价值就会大打折扣。要让尽可能多的人对这些经典学术著作，想读、能读、爱读！

《经典通读》丛书第一辑的出版，受到包括《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南方日报》等100多家媒体的关注，人民网、新浪网、搜狐网等网站也纷纷进行深度报道，其中人民网还针对这套丛书进行了读者调查，让大家发表对这套书的看法。调查结果清楚地表明，广大读者非常欢迎这样的作品，认为这是能让他们阅读这些经典的最好办法。而在全国掀起的明星代言《经典通读》活动更是引起舆论关注，众多媒体以大幅版面介绍本丛书和大家投票选出的代言明星。明星与经典学术著作的强烈反差使大家更好地理解了我们策划《经典通读》丛书的初衷。当记者在“两会”期间采访票选名列前茅的杨澜时，她表示：系统地介绍西方的人文著作，要看它整体的水平怎么样，如果很好的话，作为公众人物，去推荐或者是以其他方式来吸引青少年阅读，我觉得对推广文化也是很好的事情。

几千年西方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经典学术名著浩如烟海，与第一辑的20册同样重要的著作还有很多。受到第一辑成功的鼓舞，今天我们又推出了《经典通读》第二辑，使丛书的总册数达到40册，涵盖的作者和门类更加齐全和有代表性。

在第一辑中，马克思揭秘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用《资本论》缔造了一个新世界；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探索出“物竞天择，优胜劣汰”的自然规律，其影响力至今不衰；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创立的“三权分立”学说，是民主制度的理论基础，同时也奠定了西方的国家政权模式；伟大的爱因斯坦和他的《相对论》注定成为人类挑战宇宙的旗帜！

在第二辑中，古罗马唯一一位哲学家皇帝马可·奥勒留，通过自己的《沉思录》，解析个人对社会的责任，使领袖和平民都成为他的读者；卢梭从他的自然人性观出发，认为人生来自自由、平等，人人都应享受这一天赋的权利，他主张对儿童进行适应自然发展过程的“自然教育”，以培养资产阶级理性王国的《爱弥



儿》；亚当·斯密期望人类有冷静慎思的能力，而不仅仅受自利的驱动，于是从伦理道德的角度，以《道德情操论》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关系的各个领域作了探讨；凯恩斯创立了现代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实现了西方经济学演进中的“第三次革命”，深刻地影响了众多国家的经济政策……

《经典通读》第二辑仍然秉承第一辑的出版原则，完全站在普通读者的角度，在保持原作原貌的前提下，将经典大部头进行瘦身，力求提炼出原著精华，在原汁原味中化繁为简地通俗解读大师们的著作。对于没有能力或没有时间“啃”原著的读者来说，这套丛书能满足大家了解原著的基本需要，有“替代”原著的作用；同时，对于想认真阅读原著的读者而言，它也具备了引导的作用，真正为读者打开一扇通往西方学术经典的大门。

同第一辑一样，《经典通读》第二辑的编译者也均为年轻的学者。他们具有较高的外文水平，并且所编译的著作都在其专业研究领域之内，这就避免了已往有些编译者只懂外语而不懂专业所造成的译稿不准确、不通畅等问题。或许有人质疑年轻人的功底，其实，这些人往往只注意功成名就者的成果，而忽略了他们的成长过程。只要他们有披荆斩棘的勇力，梳理芜杂、条分缕析的细致与耐心，相信他们一定能奉献给我们期望中的经典。请别忘了，傅雷翻译罗曼·罗兰的《托尔斯泰传》时年龄不过24岁。

在《经典通读》第二辑出版之际，我们想重申《经典通读》第一辑《编者的话》中的观点：“编译毕竟不能替代原著。希望阅读完这套丛书后，有更多的读者有兴趣和勇气，并且满怀敬意地去研读经典原著，更为直接地感受和领略大师的精神风采。”

对学术经典的轻松“悦”读是我们的理想，但要真正实现难度却很大。但愿第二辑做得比第一辑好些。不当处，请读者见谅，并欢迎批评赐教。

石岱峰

2008年9月

关于西方文化历史命运的大预言

——《西方的没落》导读

斯宾格勒是 20 世纪德国著名历史哲学家，历史形态学的创立者，西方文明没落的著名预言者。斯宾格勒所创立的理论被称为比较的文化形态学或历史形态学。他反对 19 世纪流行的历史进化观念，而把各个文化的生命周期作为历史研究的对象。在他那里，世界历史被看作是若干独立的文化单元，每个文化单元都经历大致相同的生命周期，即都要经历发生、发达和衰落的生命阶段或形态。每种文化虽各有其独特的精神、灵魂和不同的表现，但都按一定的周期而兴衰，它们在时间上是平行的，因而是同时代的、可比较的。根据这种理论，人们不仅可以重建过去的历史，而且可以预知未来。据此，斯宾格勒认为，除了西方文化外，人类历史上的其他文化类型都早已衰亡。他大胆预言，西方文化也已进入没落阶段。



斯宾格勒出生于德国布兰肯堡。他曾先后就读于慕尼黑大学、柏林大学和哈雷大学，主要攻读自然科学和数学，同时广泛阅读历史、文学和哲学。1904 年，斯宾格勒以一篇关于赫拉克利特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随后，他在一所地方中学任教。这所中学位置偏僻，斯宾格勒在那里收入微薄，生活清苦，但他工作称职。据说他讲课生动风趣，在学校里与世无争，深受师生们的



尊敬。1911年，斯宾格勒继承了一小笔遗产，生活上有了基本保证，于是他迁居慕尼黑。此时斯宾格勒预感到世界大战迫在眉睫，于是产生了一种从人类历史文化深层去寻求前因后果的强烈欲望。他开始酝酿撰写一部大著作。就这样，斯宾格勒孑然一身，在慕尼黑的一间阴暗的小屋里，发奋写作《西方的没落》。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他的这部鸿篇大作已经完成初稿，之后经过修改补充，第一卷于1918年在维也纳问世。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接近尾声，西方文明的重重危机暴露无遗，人们对历史前景感到忧虑和茫然。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此书以其醒目的标题、新奇的论调和发聋振聩的先知式的预言，广泛地吸引了西方各界读者。本书出版后风行一时，几年内仅在德国就售出十几万册，这在当时的出版界可谓天文数字。按照一个评论家的说法，作者因此瞬间成名，由“一位默默无闻的中学教师立刻跻身于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列”。该书第二卷于1922年面世。此后，斯宾格勒还撰写过几本小册子，包括《普鲁士主义与社会主义》（1920）、《人与技术》（1931）和《抉择时刻》（1934）等。

斯宾格勒的思想有接近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的地方，特别是由于他1923年后的保守的政治著作，有人认为他有为希特勒的法西斯主义作理论铺垫的嫌疑。但实际上他反对希特勒的崛起，他认为德国需要的是真正的英雄，而不是像希特勒这样的“扮演英雄的歌手”。斯宾格勒对纳粹分子神话雅利安种族也持反对态度，因为在他看来每一个种族都具有独立的价值。由于斯宾格勒不能服从希特勒的意志，他时常遭到纳粹势力的批评。

斯宾格勒终身未娶，晚年过着孤独的生活。1936年5月，斯宾格勒在慕尼黑与世长辞。斯宾格勒去世前已经看到密布的战云，已经听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的隆隆战鼓。事实上，他在《抉择时刻》中就明确指出：“到处都有爆发大战的机会。”



尽管《西方的没落》系鸿篇巨制，但它并不是一部系统的著作，表述上也显得重复和含糊。它的风格是隐晦的，不是明晰的；它所提供的更多是洞见，而不是论证。按照西方学术界的思辨的历史哲学和分析的或批判的历史哲学的划分，它显然属于思辨的历史哲学范畴。当然，《西方的没落》的基本主张是清楚的。斯宾格勒把他的历史哲学称作是比较的文化形态学。这种文化形态学的基本含义可以概括为历史或文化生命说、文化心灵说和文化盛衰说。

1. 历史或文化生命说

所谓历史或文化生命说，乃是断言历史或文化是一个具有生命的、活生生的境域。斯宾格勒的这个断言的出发点是，自然与历史的对立。斯宾格勒把自然和历史看作是具有高级文化的人类用以综合和解释他的直接感官印象的两种形式，是人的醒觉意识中轮流出现的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图景。把周围的现实作为已成的事物加以整理时所得到的世界图景便是自然的世界；当把现实的事物作为方成的事物加以整理时得到的世界图景就是历史的世界。已成的事物是僵死的、机械性的、无时间性的事物；方成的事物则是生动的、有机的、时间性的事物。在历史的世界中，观察者委身于永不重复的事实；在自然的世界中，观察者则力求为一种永久有效的体系发现真理。

斯宾格勒所说的人的醒觉意识主要是指感觉，尤其是指视觉。人对自然、历史的“整理”无非是以“眼”为主的对外部世界的不同感觉。斯宾格勒承认，在自然界中存在着因果规律，但由于自然界是僵死的、机械的世界，因此这种因果性乃是一种



空间的逻辑、无机的逻辑，这种逻辑自然无法适用于活生生的历史世界。斯宾格勒认为，支配历史世界的是“时间的逻辑”，它不同于僵死的因果必然性，而是一种有机的必然性。这种必然性并不带有规律性的含义，它是指历史作为生命的生长、发展和衰亡的逻辑，这是一种宿命，所以有机的必然性又被称为宿命的必然性，它不是可以用理性去认识的对象，而是生活体验的对象。因此，人们无法认识历史，而只能用直觉、靠类比去领悟历史。斯宾格勒区分自然世界与历史世界、空间逻辑和时间逻辑的目的就在于说明历史是超越因果关系的生命之流。

在区分两个世界、两种逻辑的基础上，斯宾格勒指出，人不仅是自然的一员，同时也是历史的一员。人，就其有肉体这一自然属性而言，他不能摆脱因果规律。然而，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他有超越机械性的活生生的本能。这才是人的生命之所在。所以，作为本能的人、生命的人是不受因果规律制约的，它只遵循时间的逻辑。这样，人和历史就在生命的基础上得到统一。人不仅要去体验、领悟历史，也要体验、领悟自身，文化就是这种历史体验和自身体验的产品。据此，斯宾格勒断言，文化是通贯于过去和未来的世界历史的基本现象，所谓世界历史就是伟大文化的历史，是各种文化的集体传记。他甚至还说，人类的历史没有任何意义，深奥的意义仅寓于个别文化的生活历程中。简而言之，在斯宾格勒看来，历史就是文化，文化就是历史。

2. 文化心灵说

斯宾格勒认为，要把握他的文化心灵说和文化盛衰说，首先要进行看待人类历史方式上的哥白尼式的革命，清除两种传统的历史观念。第一种必须清除的是认为经验的历史学家把历史分为古代史、中古史和近代史这种传统三分框架。斯宾格勒认为这个框架太褊狭，实际上是空洞无物且毫无意义的体系。如果让它来主宰我们的历史思维，就无法认识人类在历史中的真正地位，无

法预测历史发展的方向，也无法涵盖不断涌现的新的历史领域。另一种必须清除的传统观念是西欧中心论。按照斯宾格勒的看法，历史是没有中心的，也没有最终的参照点。它是数量不定的文化形态的故事，这些文化形态“就像田野里的花朵一样生长，并没有庄重的目的”，而西欧文化仅仅是这些文化形态中的一种，因而没有理由把西欧这一小块土地看作坚实的“极”，让伟大的人类历史和源远流长的文化，谦虚地绕着这个“极”旋转。他把这种流行的西欧中心论称为历史的托勒密体系。他不承认古典文化（古希腊罗马文化）或西方文化比印度文化、巴比伦文化、中国文化、埃及文化、阿拉伯文化、墨西哥文化等占有优越地位，认为后面这些文化形态都是动态存在的个别世界，它们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古典文化、西方文化是平等的，并且从精神上的伟大和上升的力量看，它们常常超过古典文化。与历史中的托勒密体系相对，斯宾格勒把自己的观点称作是历史学中的哥白尼式的发现。文化心灵说和文化盛衰说就是这个发现的基本内容。

文化心灵说意指世界上的各种文化形态或类型具有不同的灵魂或观念，即基本象征符号。斯宾格勒声称，世界上曾存在、尚存在九大文化类型，它们都有不同的文化心灵。古典文化的灵魂称为阿波罗精神，西方文化的灵魂是浮士德精神。此外，阿拉伯、埃及、中国、印度、巴比伦、墨西哥、俄罗斯各文化类型都有自己特殊的灵魂。各种不同的文化都是不同文化灵魂的表现。斯宾格勒身处西方文化环境，对西方文化危机有切身的现实感受，而他对其他文化类型的研究又不深，所以，他详尽比较研究的是古典文化和西方文化。他认为，作为古典文化灵魂的阿波罗精神的基本特点是晴朗明晰，只承认直接显现在时空中的事物，在有限的形体中去寻求美感。这是因为在古典时代，人的醒觉意识里还没有所谓过去和未来的观念，有的是纯粹的现在。作为西方文化灵魂的浮士德精神，则是一个动荡不安的灵魂。它要超越



感觉，在无穷的追求中去完成自己的使命。它具有一种坚毅的意志，要征服并粉碎一切可见的阻力。显然，浮士德精神标志着西方人已经突破纯粹的现在的限制，而冲向无穷的未来。斯宾格勒还从数学入手进行文化类型的比较，从中也可以清晰看到，热情关注现世和此刻的古典文化的阿波罗精神，与狂热向往无穷空间的西方文化的浮士德精神之间形成鲜明的对照。

应该说，斯宾格勒的文化心灵说坚持文化类型的多样性，这对于反对西方中心论，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不过，斯宾格勒的文化心灵本身毕竟是有待说明的观念性的东西，但他并没有进一步研究产生每个文化类型之灵魂的经济条件、地理环境、民族传统和文化交流等各种因素，这样，他的文化心灵就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成为一种神秘的、先验的东西，其实质是唯心主义的。另外，斯宾格勒把各种文化心灵看作是互不联系的、相互隔绝的东西，其中最典型的是他把古希腊罗马文化与西方文化看作是两种互不相关的文化类型，这种观点无法解释文化之间的传承关系，而近现代西方文化与古希腊罗马文化之间的传承关系显然是不容否定的。

3. 文化盛衰说

斯宾格勒的文化心灵说讲的是各文化类型都有自己的观念、感情和愿望，即各有其相异之点；而他的文化盛衰说讲的是各文化类型的相同之点，它们都经历同样的兴衰过程，走向同样的归宿，即都要经历青春、生长、成熟和衰落这几个阶段。

与历史三分法相对，斯宾格勒提出文化兴衰三阶段论。人类文化，不管是何种类型，都要经过这样三个阶段：前文化阶段、文化阶段和文明阶段。三个阶段形成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每一个循环周期长达 1400 年。斯宾格勒所要揭示的是西方文化的历程及其归宿，论及其他文化类型都是服务于这个主旨的。文化盛衰说的重点在于论述西方文化的三个阶段。斯宾格勒不把以古希



腊罗马文化为代表的古典文化划入西方文化类型，在他看来，古典文化早在公元100年就已没落，西方文化应从公元5世纪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由日耳曼人建立的法兰克王国算起。所以，斯宾格勒把西方的前文化阶段划为公元500—900年。这实际上是西欧奴隶社会末期至封建社会初期这段时间。文化形态学撇开文化的历时性，只讲同时性。各文化类型只要在兴衰过程中处于同一阶段，不管其实际的历史相距多远，斯宾格勒都把它看作是同时代的。例如，西方的这个前文化时期相当于古典文化的迈锡尼时期（前1600—前1100），中国文化的商朝（前1700—前1300）。斯宾格勒把这个阶段的文化特点概括为原始的表现形式的混乱，神秘的象征主义和朴素的模仿。

接着是文化阶段。它又可分为哥特时期（900—1500）和巴洛克时期（1500—1800）。这正是西欧封建社会从盛期走向没落和资本主义开始萌芽的时期。斯宾格勒称之为文化发展的青春时期。这个阶段的感情世界表现为装饰、建筑及各类艺术。如哥特时期的圆顶教堂；从乔托到米开朗琪罗的壁画和雕刻。巴洛克时期则有贝尼尼的建筑；从提香到伦勃朗的绘画；从巴赫到莫扎特的音乐等等。文化阶段临近终结时，有浪漫主义风格的兴起，表现为贝多芬的音乐和德拉克洛瓦的绘画。这个西方文化的第二个阶段，逐渐形成了一套严格的形式语言，它约束着各种文化创造。但浪漫主义风格的出现，意味着庄严形式的消灭。

文明阶段是西方文化的第三个阶段，也是最后一个阶段。文明的第一个时期是19世纪和20世纪，相当于中国历史上的战国时期。这个时期形式被破坏，文化表现为无内在形式的生存。这是现代艺术的世纪。作为它的象征，有李斯特、柏辽兹和瓦格纳的音乐；从康斯坦布尔到马奈的印象主义，还有美国的建筑。文明的第一时期实际是资本主义鼎盛时期，金钱统治表现为民主政治；文明的第二个时期，则由民主转向集权统治，斯宾格勒称之



为帝国时期。它意味着文化的最后衰亡。斯宾格勒断言，其他文化类型的战国时期、帝国时期均已过去，唯有西方还处在战国时期。帝国时期则要到 2000 年—2200 年间才能到来。

斯宾格勒在分析比较埃及、印度、希腊、阿拉伯、中国、西方等众多文化世界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既然其他文化类型都经历了从兴盛到衰亡这样一个过程，那么，西方文化的历程也不可能例外，西方的没落是不可避免的。

当然，斯宾格勒在论述这个主题时使用的是归纳论证，但文化的消长、盛衰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仅靠有明显局限性的归纳论证是难以得到科学结论的。



总体而言，《西方的没落》基调悲凉。斯宾格勒对西方文化行将衰落的预见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导致的西方社会的种种弊病相契合，表达出当时西方人对自己的前途所感受到的深刻忧虑和悲观情绪，从而给西方思想界以强烈的震撼，给后人以巨大的影响。尽管不少专业的历史学家鄙视斯宾格勒歪曲历史事实和任意使用历史材料，不同意他所得出的结论，但人们无法回避他所提出的问题。也许，《西方的没落》的价值不在于它的具体结论，而在于它的独特的理论以及它引发的讨论和思考。

从理论上讲，斯宾格勒首创比较文化形态学或比较历史形态学。文化是一个具有内在结构的有机体的观念，在当今西方文化学界已经成为一个公认的常识，但在当时这无疑是一种冲破旧范式的新颖独到之见。这种新观念要求人们在对历史文化做历时性研究的同时，重视和发展对文化有机体的共时性研究，这有利于拓宽历史研究的视野，加深人们对历史意义的理解。斯宾格勒有

关文化结构的阐述是其整个文化历史哲学体系的关键。他认为含义各异的诸种文化类型具有共同的结构，这种结构主要由文化的心灵和文化的形式语言构成。对文化结构的这种剖析富有启发性。从实际情况看，斯宾格勒的比较文化形态理论对历史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文化人类学家都有较大的影响。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一书，继承和发展了斯宾格勒的理论。美国社会学家索罗金，文化人类学家克罗伯尔、诺尔斯罗莆等人也吸收了斯宾格勒的理论成果，他们被称为“新斯宾格勒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斯宾格勒所提出的历史形态学理论也曾被移植到中国，并成为当时在西南联合大学的雷宗海、贺麟为首的“战国策”派的历史理论基础。

从方法方面看，斯宾格勒倡导一种贴近生活、预断未来的历史研究新方法。他的历史研究的重点不再局限于对古董、文物、史料这类死东西的考证注释上，而是主张历史研究要与方成的事物相衔接，体现出鲜明的时代精神，因而具有强烈撼人的现实感。这种方法与斯宾格勒研究历史的动因是相联系的。他试图通过历史研究来预测西方文化的前途和命运，因此他在思索现实——历史问题时需要采取宏观、整体、比较的思维方法。这种方法对后来的历史哲学的发展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从现实角度看，斯宾格勒的预言成为西方人的永恒警钟。一个世纪以来，西方的前途和命运始终成为西方理论界和知识界忧虑不安的问题，应该说，这种忧患意识对于深刻反思和引导西方文化的发展是必不可少的。



《西方的没落》一书共分两卷，第一卷为《形式与现实》共



十一章，在初步阐明了理论主张之后，斯宾格勒转而从具体方面阐释，例如音乐、建筑、自然；第二卷《世界历史的透视》共十四章，先概述了宇宙存在的某些观点以及高级文化类型的区分，然后从政治、国家、民族、城市、技术、货币经济等方面展开论证。但在这一过程中，往往表现为一种相互交错，也就是说边提出自己的观点，边加以论证。

艰深的著述风格并没有抹煞《西方的没落》的巨大价值。在今天，东西方的发展渐趋接近，尤其是与中国的迅速发展相比，西方的发展显得滞缓。此时，重读《西方的没落》，感受西方智者将近一百年前对于西方文化乃至世界文化的反思，肯定有一番新意。如果能够摆脱经院史学的窠臼，提取原著中的精华，降低学术史学的门槛，运用通俗、易懂的表达方式，使得原著中的历史智慧和历史理性真正得以在更广泛的人群中传播、普及，使得史学更加贴近大众，这既是历史学的功用发挥的表现，也是从事历史研究的人员的职责。我们正是出于上述考虑对《西方的没落》重新加以编译。

本书参照 Charles Francis Atkinson 先生的英译本。在改编时，作者对两卷本进行了贯通整合，力求比较正确地理解和准确表述其中的思想，剔除其艰涩难懂、过于庞杂的部分。但由于作者水平有限以及编写的特殊要求，所以书中难免会有许多不足之处，甚至可能会出现一些偏差，请读者见谅！

杨玉成 韩 炯